

浮尘岁月

李硕儒 著

浮生歲月

李硕儒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岁月 / 李硕儒著.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6-6519-9

I. 浮... II. 李... III. 李硕儒—自传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911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14085 营销中心电话：(010) 64010813

三河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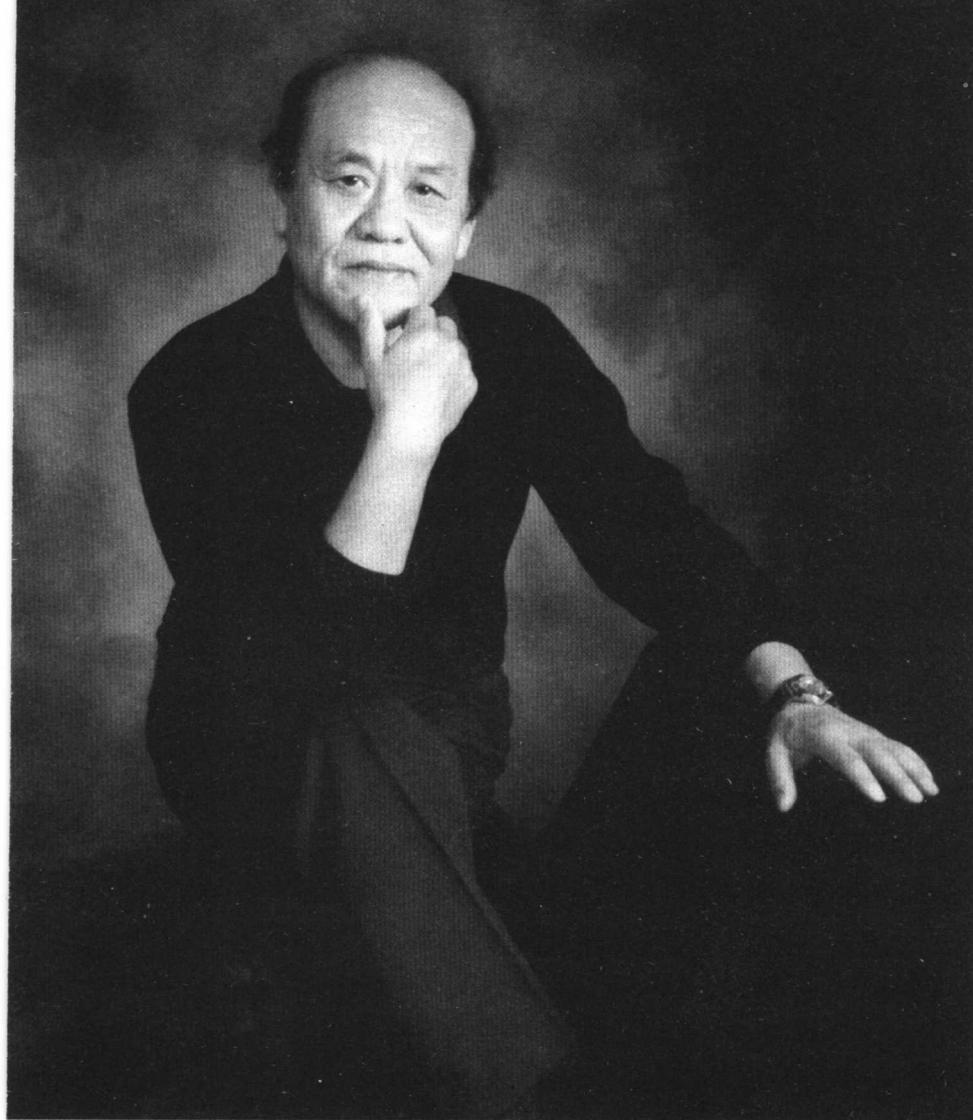
700×1000 1/16 17 印张 1 插页 200 千字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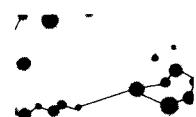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作家小传

李硕儒 1939年生于中国河北省，长于北京市，做过记者，编辑，编剧，导演，大型文学期刊《小说》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作家。与命运相约，终归成了生命旅途的旅人；流落过内蒙古，闯荡过西非洲，终于定居美国旧金山。

总在追寻，耽于笔耕，创作出版过小说集《爱的奔逃》，散文集《红磨坊之夜》、《外面的世界》（曾获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二等奖），散文随笔集《浮生三影》、《彼岸回眸》等。与人合作创作过长篇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曾获电视剧“金鹰奖”二等奖），做过长篇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冼星海》、《周恩来在上海》的文学顾问。与人合作的50集长篇历史剧《大风唱尽汉时歌》正在筹拍中。



自序

少年时候，曾以为我即世界，世界即我。我有欢乐，似乎天地都与之同欢；我有悲哀，好像日月都为之变色。“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待到梦醒秋清，才知道我不过是一粒沙、一颗尘。悲欢尽管悲欢，沉浮尽管沉浮，日月照样阴晴，大潮照样起落，圣贤伟人若此，何况区区如我。

然而沙尘也有它的历史、尊严和苦乐。要是你能耐心去读并且读懂，也会看出它的丰博与瑰丽、激情与思考，或者从中还能窥见将其淘蚀成沙尘的庞然大物、宇宙星辰……或许正基于此，才有一沙一世界，一花一王国的话语。

夜深人静，形单影只，冥冥漠漠中常看到一粒尘沙，在洪荒里躑躅，在苍空中飘零，虽轻小而微，却总不忘其动……覩目以视，它的动迹也自成线，线虽杂乱，也成人间一景，于是惴惴描出，或可记忆。

作者

2006年春于北京



目 录

• 自序 1

荒原晓月 1

春残秋清 48

东去西来 189

跋语 265





荒原晓月

一

那时,我正年轻。那时,曾以为我未来的天空会是一片晴朗。许是因为我不丑,许是因为我有一副健壮的体魄和一份不错的职业,上班写作之余,每当走在街头步入舞场或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都会招来少女们并不嫌恶的注视……于是开始社交,于是接触着一个个资质不凡的男人和女子。万没想到,在一次不经意的春节舞会上,我开始了初恋,以致曲终人散后,我浑身发热终宵难以入睡,刚一闭眼,她清甜而寂寞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刚要入睡,她迷茫多情的眼睛就刺痛我的神经……其实,她比我坦率,或更确切地说比我勇敢,第三天,她就约我去北海公园。

那是正月初二的上午。雪后初晴。冰封许久的北京散发着少有的潮润,在我眼里,四季常青的冬青似乎青翠欲滴,形容枯槁的杨树柳树古柏,也不再落寞不再枯槁……两个小男孩儿正在冰冻的湖面上滑冰,歪歪咧咧,大声叫闹。突然,个子细高的那个一个趔趄摔倒在冰上,头上那顶两耳晃来晃去的皮帽子甩得老远。看着他的狼狈相,个子矮的男孩儿合掌大笑,一不留神,扑腾一下也摔了个“嘴啃泥”……我禁不住想笑可又没笑出声,反而晃着拳头大喊:

“别丧气,小朋友!起来再滑!”

许是这猝不及防的喊声吓着了她,她下意识地靠拢在我身边,我下意识地搂住了她的肩。她带着温馨的鬓发痒痒地触着我的面颊,一阵羞涩,彼此倏然离开,彼此倏然红了脸……



我们接着再约、再见，有时相对无语，有时说个没完，见时心里满满的，走后留下无限空洞……那些天我十分敏感，那些天我不知有多少惆怅……

一个大风天，她在我的房间里待得很晚。

“我该走了。”她说。

“我送你。”我说。

从我住的单身宿舍二十四间房胡同走出，经校尉营、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往西，我们信步走到南池子。这里正修自来水地下管道，马路挖成大沟，路旁堆满黄土。

风更大了，路上几无行人。一阵狂风吹来，卷起路边的黄土，一时间，沙尘漫漫直上夜空，高悬在电线杆子上的路灯也狂虐地摇晃。顿时，我们印在地上的影子虚虚渺渺地旋转起来。

“头疼……”她皱起两条好看的眉毛，似是呻吟地说。

“厉害吗？”我盯着她，眼睛穿过旋浮的沙尘黄土。

“没关系……经常的……”她苦笑笑。

“为什么会这样……没去看过？”

“也算老病了，不管它……”她又笑，笑出几许沧桑。

一阵悲哀撇走我的心，我想用我的一切安慰她，“……我……”我的心有些乱，满满的，有些痴迷，“我感觉……啊，我感觉我离不开你……”说得十分费力，不知为什么我偏偏在这样的氛围、这样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心在打颤，头脑里一片恐惧，一片空白，我似乎在等待着她的宣判。

“你会后悔的……”迟疑了半晌，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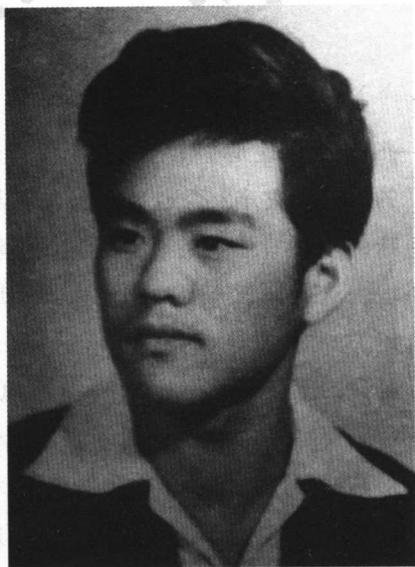
“不，永远不！”

又一阵凶煞的风，裹满沙土的风堵住了我的嘴。

……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预感抓住了我的心……我似乎看到普希金正在与他思慕很久的爱妻站在神父面前，忽然那摇晃的蜡烛灭了，普希金欣喜的脸一片煞白，他恐惧地自语：“难道，难道这是个不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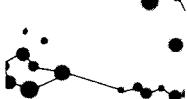
母亲怀中的作者。摄影师快门未按，他先痛快淋漓撒了一泡大尿。



1958年，作者初入《人民日报》社工作。



1962年，作者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偶游颐和园。



兆？”难道这是个不祥之兆？我也自语。难道我的表白是罪恶？难道她的回答是灾难？否则为什么这狂虐的风越刮越大？否则为什么这带腥味的沙土堵住我的嘴？管他，人生本就虚虚渺渺，生命总要被黄土掩埋。这或许意味着我们一生将在风雨中度过，或许意味着我们将共同走完一生，共同被黄土掩埋。与一位我深爱着的姑娘同生同死何尝不是我的福分？我抱住她，第一次疯狂地吻着她……

青春期的恋爱就像入暑的天气，热起来烧得灼痛难忍，冷起来冰得从心底往四肢打颤。反复几年，我有时狂热地提笔成诗，不知写了几百首；有时痛不欲生，几欲早些了结那结满苦涩和思念的生命，终归，我们谁也不明白这是不是爱。我长长地陷入无奈，爱的无奈。

在那些年代，恋爱也是要经组织审查受组织控制的，尽管我不是党员，团员也不是。

“你那个女朋友的确年轻漂亮，可组织认为，你们再交往下去是不适宜的。”领导点起一支香烟，神态温和，开始了那场决定我命运的谈话。

“为什么？”我浑身打颤，不知是愤怒还是感到了受辱。

“她出身不好，自己表现也很差，何况她已经影响了你的工作！”

我紧盯着她那双凄迷的大眼睛。我吞噬着她无力又无奈的啜泣，我告诉她我不怕，别人越歧视我越真心实意地爱，直到永远。我胸闷，血液堵塞，我要大声呐喊，为她也为我的爱，“出身不好是她父母的事，交不交往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没意识到在那个几近禁欲的年代涉及个人私情时每个人都要戴上一副假面具，更没意识到我的率真会被他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是“政治素质太差”，是为“爱一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大发歇斯底里”，我只感到自己在受辱，连同我的心、我的爱、我的人格、我情感世界的偶像。我要抗争，要洗清我受到的凌辱，我脱口说出了在当时时尚认为是一句大不讳的话：“何况，我并不是共产党员！”

“啪！”他拍响了桌子，随之掐灭了他刚吸一口的香烟，“我为此庆



幸。就你的素质说，恐怕永远也成不了共产党员！可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一名国家干部，党报的工作人员！”

“党报的工作人员就不能恋爱？”

“自然可以，但要看你恋爱的对象是什么人，这是党对你的爱护。”说到“爱护”，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于是放缓了声音，面部肌肉也极不自然地松弛了一下，像是发痉挛，“你不想想，一个被杀、关、管的子女，一个仍然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话剧演员，就因为她长得漂亮，就弄得你神魂颠倒，这值得吗？你是在政治上走钢丝！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前途，政治前途！”

“请你不要亵渎我们的感情！”我不明白那高深的政治前途与纯洁的爱情会是那么水火不容，我更不理解那所向披靡的政治为什么就不能容纳那可怜可爱的弱女子，我觉得我所有的血管都在肿胀、在燃烧，我甩门走出那个房间。此后，那位领导再没找我谈过话，有时走到对面也视若未见，交臂而过。

一年后，在一次“革命化”运动中，我被列入了批判帮助的对象。那时还不像后来的动不动就开千人大会万人大会，组织一再强调纯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意识形态问题，要和风细雨，但也要面对面地指着鼻子批判。批判的内容大体是：1.有浓厚的资产阶级名利观点。表现是热衷于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这自然一为出名，二为拿稿酬；2.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现是社交面太广，爱跳舞，从来不穿大家都穿的蓝色或灰色制服而是穿西装；3.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恋爱观。表现是恋爱不注意政治，不向组织汇报，虽经组织耐心帮助，却仍执迷不悟，与那个资产阶级臭小姐打得火热……自然，在这种场合我是不能说话的。我能做的只能是做出认真听取批判的姿态，其实，我一点没听清他们的分析批判，更没看到他们是如何义愤填膺疾恶如仇，我只为她的不幸悲哀，为我不能代她抗争而悲叹而自疚。

我执著的爱并未收到顺理成章的回应，一点都没有。

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刚进10月，一场风雨就把院子里老槐树



的叶子刮成枯黄，到处飘飞。那天下午，我应一家电影刊物之约，写一篇影评。尽管文思缕缕，还是不断被窗外树叶擦地的声音打断。我盼着她来，无论风声还是落叶声一响，我就扭头外望，以为是她来了。已近薄暮，仍没她的影子，我只好沉下心来写作。

“笃笃笃……”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果然是她。

我抱住她，她的吻却十分落寞，落寞得发冷。

“你怎么了？”我手足无措。

“……我在街上走了很久，”她推开我。

“一个人？”我望着她。

“我想，我今天要不要来……”

“为什么？你……”激跳的心在下沉。

“因为我不可能带给你快乐……我不愿这样……”她背向我，低着头。挺秀的背在抽动，那条长而粗的发辫也透着凄苦和无奈。

我抚着那背，揉着那发辫……“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十分焦虑十分急切。

她蓦然回身，泪眼莹莹：“你今年24了吧？”

“这还要问？”我被她抛入五里雾中。

“该结婚了……”她攥住我的手，可眼睛并没看我，像是自言自语。

“要是你愿意……”我更加懵懂。要是她愿意，我自然愿意接受，可看她的神态，又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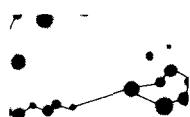
“不，”她苦笑，“我是说，你该找个好女孩儿，你该结婚了……”她哭了，哀哀哽咽地，好久好久，劝也劝不止。

“……怎么回事？……”我抱着她，吻着她咸涩的泪，“你不爱我？”她急切地摇头。

“那你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天已完全暗下来，夜幕遮蔽了我们的空间，我们没想到开灯。

“……我要走了，剧团已经下了调令……”她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



相。

“为什么？”

“还用问？当然是因为家庭出身。”

“调哪儿？”

“西安。”

“我也去，我明天就申请调西安，那儿也有报纸。”不知是为安慰她，还是以为这样我们的爱更有保障，我甚至感到一阵轻松。

“不不，”她捂住我的嘴。

“为什么？”

“我不要你的怜悯，更不要你为我牺牲。”她十分绝断。

“这是我情愿的。”我也十分坚决。

“……我命不好，生在这样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好命……”她又啜泣，啜泣的。

“只要有爱，什么命不命的！我愿意承担你的一切。”

“不，”她擦了擦眼泪，“我想好了。今天来就是跟你告别的……我们，分开吧……要认命……”她趴在我肩上，再也忍不住地哭起来。

我安慰她很久也争了很久，可仍未能说服她。半个月左右，她走了，没再告别，也没给我电话，只说到西安安顿下之后她会来信的。我不知打过多少电话，去找过她多少次，始终没见她的踪影。她真的走了，剧团和家里都这样证实。

可我还是天天寻找，在我们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公园剧场、电影院、饭店……每一处我都走了一遍又一遍。开始的几个星期，我几乎每天下午去我们常去的正义路街心公园。当时，那里还是使馆区，有一种独有的风情与雅静。我坐在我们常坐的那张绿色长椅上，回忆着这张长椅上曾经有过的旖旎和气息，盯视着周围一切走过的女人……那天，绿荫深处有一个貌似她的背影，我急奔过去，正要呼叫，却见那长长的发辫是深栗色，那扭头斜视的脸是白种人……我盼着的奇迹终未发生，除了织补那些甜蜜又苦涩的回忆，我什么也没找到。



1965年初冬，我被列入报社派往农村的第二批“四清”工作队。这里有准备提拔重用的先进骨干分子，也有如我这样的需要锻炼、需要改造的政治素质太差的落后分子。不管什么面貌的人物，表面看来我们却是形象装束都十分相似的：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半旧棉军装，一样的带护耳的皮帽子，每人背着一卷简易行李，浩浩荡荡地上了报社的大客车，一路烟尘地开往北京远郊房山县农村。

我和画家方成被分到一个贫农成分的年轻光棍儿家里。这人很朴实憨厚，加上方成的幽默诙谐，我们相处得很好。可没住几天，不知这贫农怕我们不方便，还是与我们住不惯，他却搬到别人家去搭伴儿了。方成和我很觉难堪，这农民却十分诚朴地笑着，说实在是那家老头没人做伴儿，他不能不去，我们这才释然。“四清”工作队很紧张，白天要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还要参加劳动；晚上要碰情况定策略提审“四不清”干部。不久，分团团长胡绩伟提出建立一个“四清”宣传队，宣传政策，号召群众对“四不清”干部政治攻心。报社方面抽调唐米、方成和我，同在一个分团的北京工业大学方面选调了七八名能歌善舞的学生共同组成了这支宣传队。由唐米任队长，方成负责化妆、舞美和幻灯片制作，我负责编剧和导演。浓重的政治氛围，朝气蓬勃的周围环境，一下子好像换了个世界。我的失恋我的落寞似乎渐渐远去了，被当时的气氛和使命驱赶，我只想写出些好节目好剧本。常常地，同在一支电灯泡幽幽的光照下，听着地炉上滋滋翻滚的水汽声，方成自言自语地画他的画，我则振笔疾书我的剧本。我们坚持现写、现排、现演，几个月中，我写脚本，方成制作幻灯片，竟合作完成了两部幻灯剧、一个独幕剧、五六个评书相声段子！入夜，我们背着幻灯机，扛着麦克风，上山区、下平原，为贫下中农演了一场又一场，每到一地，台上全力以赴地



投入,台下呼口号擦眼泪地应和,真还达到了水乳交融。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体验到很少体验过的充实。不知是过分自信,还是天生愚钝,我一时竟忘记了自己是被视作接受改造与锻炼的对象派往工作队的,常常还陶醉在这种紧张艰苦又充实的生活中。

春节到了,我们被接回北京过年。出于时代的激情,也是为了反映“四清”的收获,胡绩伟与报社诸领导安排我们在大礼堂为报社同仁演出一场晚会。与在农村一样,仍是方成操作他亲手绘制的幻灯片中的人物,我在音乐的伴奏下,为我自己写作的各个男性人物配音,女性人物仍由北工大的一位女生配音。晚会后,全场沸腾。中国美术家协会听说后,又安排我们在中国美术馆为美协会员们演出一场。之后,我脱掉那套满身滋油的棉军装,在清华园浴池彻里彻外洗了个痛快澡,换上平日穿的呢大衣时,觉得满身轻松满心充实,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现实生活的魅力。

可就在假期届满准备重新开赴“四清”第一线的前一天,部门领导通知我说,组织决定调我到内蒙古杭锦后旗工作。我知道“旗”就是县。我问是长期还是短期?回答是长期,带户口和一切组织关系。我问为什么?回答是工作需要。我问做什么工作?回答是由那边组织安排。我问还要不要去“四清”?回答是不必了……

我呆坐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刚刚鲜活起来的心在褪色在沉落似乎已无力启跳,只有一个苍老的声音提醒我:“完了,你一切都完了……”为什么完得这么惨?就因为我交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女友!这之后,即使我心悦诚服地乐于在“四清”工作队接受锻炼、接受改造,人家也再不容了,我的归宿只有发配到内蒙古。

三

我实在不愿去内蒙古。因为在我当时的想象中,它太遥远太荒凉,



我也没想过继续留在报社不走的事儿。在我的人生辞典里还从没有过要赖和乞求这样的词汇，何况人家已经明令通知我离开，何况在这里的种种氛围和际遇已经使我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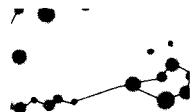
一天，一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的中学同学带着一位穿黄军装的朋友来访。原来这“黄军装”是兰州军区话剧团的演员，与我那中学同学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大学同学。他们这次来京就是想调一个年轻的编剧和一个年轻的导演，以发展他们的事业。那导演基本物色好了，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问我愿不愿去他们那里任编剧。这一下燃起我的热情和幻想。我酷爱文艺尤爱创作，想象着到了边塞军旅，自然可写出好作品。我于是写好简历找些我以为可代表我水平的作品，交他后即等待兰州军区文化部长的最后裁决。

一个月后，“黄军装”来通知我说，部队十分满意我的情况，但既属中途调动，还要取得报社人事处的同意。我同他一起去人事处，人事处长满口应承，说：“李硕儒同志能去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锻炼，我们自然是十分支持的。”情形似乎是只等最后办调离与接收手续了。我这才明白，所谓内蒙古的“工作需要”纯属是要发配我的遁词和伪词。我真不明白，一个权力能左右上千人命运前途的党报机关在对付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时，又何必以伪善的面孔伪善的词句遮遮掩掩？！可不管怎么说，我与“黄军装”还是高兴而别，只待他通知后即奔赴兰州。

我一面整理服装衣物与书籍，一面陪父母弟弟妹妹向北京的亲友告别，一面等待启程。奇怪的是，此番离别前的等待少了些眷恋与凄凉，似乎更多了些向往与期待。

大约4月底，“黄军装”来通知我说，江青请他们看了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之后，发表了林彪委托她讲的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讲话，“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是史无前例的，也将翻天覆地，今后谁将到哪里去都说不准，我的调动自然只能搁浅了。

果然，那些日子的社会气氛就颇怪异，似乎人人都很兴奋也很惶惶，人人都急急地上班很晚才下班，学校里很晚都不放学，直到晚上九



十点钟，还从学校里传出一阵阵狂躁的口号声……大有山雨欲来的架式。

“运动真的要来了，”父亲吸了口香烟，忧思重重也希望重重，“我跟报社交涉一下，看能不能不走了，就在报社参加运动。”

“能这样就好了，”母亲这些天很少说话，总是暗暗地边擦眼泪，边为我收拾衣物和衣箱，“那你明天就去？”

“不用了，”沉默很久，我对爸爸说，“我不愿爸爸为我去乞求他们……”

“这也不是乞求，同他们陈述一下做父母的心情，我总有这权利吧？”父亲有些激动。

“爸，他们不懂这权利，也不会尊重这权利……”

父亲点点头，一脸愁苦。由于他在旧社会的一些经历，他太懂得在那些年代里人的权利的分量了。

第二天晚饭时，父亲说：“还是准备去内蒙古吧……没希望了……”

我望着他，父亲额上的皱纹更深了。我知道他还是去了报社，做了他认为父亲必须为儿子去做的陈述和乞求。我的心一阵疼痛，正想说些什么，母亲的目光制止了我。我受不了那悲悯、那无奈，尽管我知道这是我的父母独有的爱、独有的情，我珍惜它，我以它为生命的根、生命的水、生命的空气，可我受不了，我决定尽快买车票尽快去内蒙古——这个他人为我划定的生存空间。

正要准备买票启程，接到一封字迹熟悉的西安来信。我的手不由地颤抖起来……颤抖着，我开启了那封盼望已久的信。这信再没有以往的蹊跷与哀愁，似乎是急急写就的，充满了焦灼和愧疚，说她是从她妹妹处得到我要下放的消息，不用问，这下放自然与她有牵连。她问我愿不愿意去西安。说她已通过关系找到《西安晚报》的总编辑，介绍了我的简况和我们的关系，那总编十分慷慨，欢迎我去编文艺版……她一再嘱我，要是愿意这个安排，就尽快寄去简历和代表作……绝处逢